



YESHIXIANG WENJI

叶世祥文集

第二卷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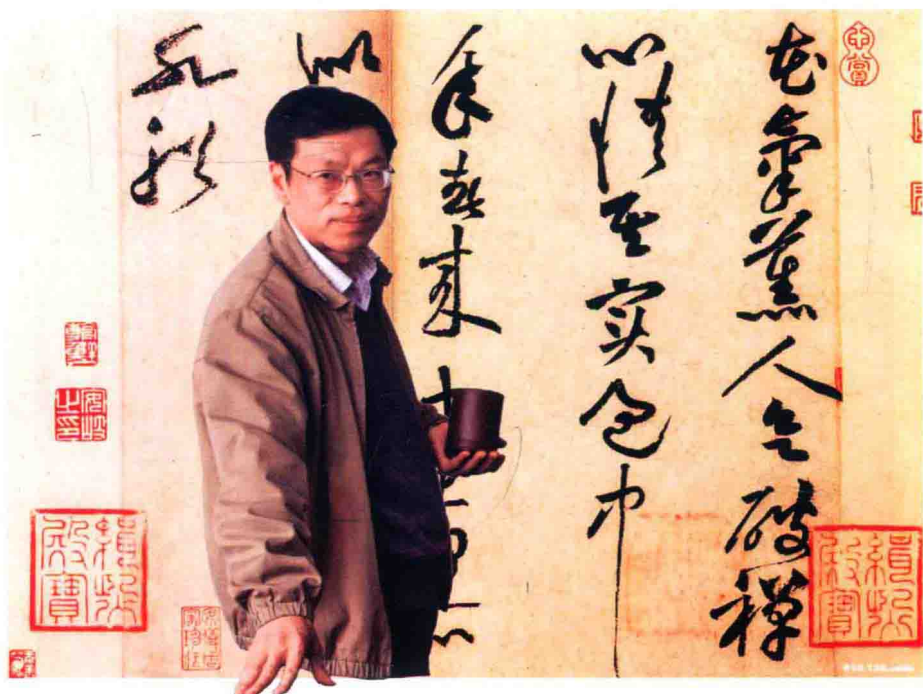
YESHIXIANG WENJI

叶世祥文集

第二卷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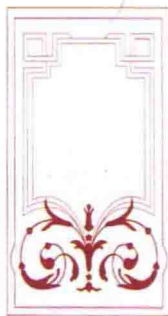
叶世祥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2009 年，叶世祥在内蒙古

20世纪 中国审美主义 思想研究

叶世祥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书影

在美学的极限处：生命的沉醉

——谈王-川《意义的瞬间生成》

叶世祥

作为一个专攻文艺美学的首批“国产”博士，王-川能给我们的美学界带来什么？一九八七年初冬那个灰蒙蒙的清晨，在北京师大校园里看到王-川博士论文答辩会的海报时，我首先涌起这了满怀期待的想法。先睹为快的渴望随即驱使我挤进那间长方形的会议室旁听王-川的答辩。面对谢觉、王春元等七位学术界名流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王-川颇为自信地宣读了论文《意义的瞬间生成》（以下简称《意》）的提纲和摘要。从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杜威等一串、悠长的英名中，我隐隐感到些许失望：我们的学者怎么就只愿自己构建一个理论体系，而只能气喘吁吁地去给别梳理阐释别人的理论呢？

《意》被列为“文化与哲学”丛书之一由山东文

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

陈大康

序

马大康

这是弥漫着焦虑和浮躁的年头。人人都为着出名、为着赚钱、为着谋取哪怕一丁点蝇头小利，急匆匆四处钻营，孜孜以求。甚至连本应固守讲坛和学术领地的教授、学者们也耐不住寂寞，被这股旋涡所裹挟，开始寻找并磨练“诗外”的功夫，蝇营狗苟起来。只有少数人还仍然埋头学术，踏踏实实做学问，叶世祥便是其中一位年轻学者。读了他的新作《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我更确信这一点，也对中国学术的未来还抱了一线希望。

读《研究》是痛快的，不仅文字痛快，字里行间流露的智慧更令人击节称快。你不断会有新的发现，不断得到精神和心灵上的启迪，宛若春日登山攀崖，时不时有一片新风景骤然展现在你眼前。然而，在这痛快的背后却潜隐着艰辛的理论跋涉。自2003年发表《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审美主义》，2007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至2010年年底结题，作者一直在这片园地深挖细作，耕耘不辍。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按捺住自己的感慨，来谈谈读书心得。

“审美”本身是一个人人均可意会却难以解说的“大词”，一旦拖上“主义”，成为众声喧哗，其嘈杂、混乱更是无法用确定的理论话语来定义。为此，作者选择了一条看似笨拙却极其明智的理论途径：一一梳理关于“审美主义”的种种言说，来澄清“审美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所具有的特殊含义。通过这种老老实实的繁难的清理，作者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归纳为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从本体论上，突出文艺的审美本性，强调审美的超越性、审美的独立性、审美

的纯粹性；二是从功能论上，突出文艺的审美救赎功能，将审美视为一种生存态度；三是从价值论上，在审美与现代性的繁复关系中高扬感性、自由和审美理想；四是作为泛审美化时代里一个富有小资情调的世俗话语中的雅词。有人或许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理论概括，可是，其分析方法所具的现代意识却不能不令人赞许。

提到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起源，人们自然会想到作为“诗国”的古代中国的审美传统，想到跟诗性思维密切相关的汉语的诗性特征，似乎审美主义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且一以贯之的。因此，热衷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者们，大多致力于用现代的语言置换古人的言说，用现代的范畴意识斧斫规范古代范畴，将充满活力的零星思想拼凑编织成一个干枯的逻辑“体系”，恰恰忘记古今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因此也就忘却了最为重要的“转换”工作。《研究》通过有说服力的辨析来阐明古典美学思想与现代审美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出：“中国古典美学，要么对人的一切晦黯的、冲动性的本能干脆忽略或一笔勾销，要么一古脑儿将人的晦黯的、冲动的本能发挥到极致，来个彻底的‘感性优先论’甚或‘肉体优先论’，这种总是想用统一性来消解对立面的思维惯性显示出的对生命张力结构的回避或漠视，使中国古典美学，即便呈现出强烈的审美主义倾向，亦与现代审美精神相别天壤。这种巨大的差异，使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于安详宁静的和谐境界中总显得消极、显得被动，不像西方现代审美主义那样，总是那么轰轰烈烈，在生命的沉醉当中相当积极、相当主动地领受着审美的欢欣。”这一根本区别决定了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不可能由古典美学思想的胚胎自然发育而成，只能结合近代以来发生巨大变化的起源语境来分析。《研究》的这些论述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学术敏感。他总是能于人们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地方，看到问题之所在，努力寻绎解决问题的线索。

当然，这种学术敏感并非仅仅源于天分，它和作者的理论视野分不开。《研究》没有仅就思想来谈思想，而是试图重构历史语境，并于特定语境中重新解释历史，还原思想真貌。其中，最为重要的历史语境是：现代稿酬制度和文学商品化进程；现代教育制度所导致的文学学科建制的确立；学会、社团、刊物等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如果说，商品化进程促使文学从“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转变为安身立命的“严肃的工作”，将文学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

来,革除了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调,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最现实的起源语境的话,那么,文学学科建制和公共空间的形成,则使审美知识生产具有了现代形态,终于从个体言说转变为“主义”话语。因此,“在审美创造和审美研究已然在严整的学科建制内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现代审美主义不可能只是古代凌空蹈虚的审美情怀的现代翻版”。其实,现代教育对文学的影响远远不止于确立文学学科建制。这种跟以往的私塾(“私塾”在实质上还仍然依附于封建“家庭”)迥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集聚起特殊的社会群体;这是一群刚从家庭这个“牢笼”逃逸的年轻人,他们还没有真正踏进复杂艰险的社会生活,严酷的生存竞争和经济压迫还没有成为他们的切肤之痛,更没有窒息他们的浪漫激情,他们渴望着独立的自我和自由的爱情。这样一群多愁善感的年轻人,他们天然地倾向于新思想、新文学。可以说,正是他们成为启蒙思想和新文学最重要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没有他们,现代审美主义思想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重构语境固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背景,却并不保证能够正确把握历史,真正了解历史还必须如狄尔泰所主张的要亲身体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研究》的作者最重要的研究特色:他不是埋首旧书堆,戴着近视眼镜去翻找所需的资料,而是用“心”去研究,用“心”去思考。

《研究》引用了《文学研究会宣言》的一段话之后,分析道:“现在再读这段话,我们平心静气地滤去时代喧嚣中的激昂感,至少还可以读出这样的意思,当文学创作还不可能作为一种职业的时候,人们事实上也只能‘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所以我们与其说这是对一种不严肃的创作态度的强烈否定,还不如说是对以往文艺创作现状的一种准确概括。而且,把这与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进行对照,我们又可以看出二者惊人的一致性:既然天经地义地宣称治文学的人当以文学创作为终身的事业,其实就是要人们不再以游戏和消遣的方式对待艺术,而要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献身精神,当然,这种献身精神不是为什么玄虚的道义去舍生取义,而是‘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将其视为实实在在的工作和职业来对待。因此,比起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标榜来说,我反而在文学研究会的宣言中读出了另一种更切实的以人的生存为基设的‘为艺术而艺术’。我甚至还要不避节外生枝之嫌补充一句,那么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公开宣告,要将文艺作为终身的事业,没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

精神,其底气来自哪里呢?或者干脆就说,这种舍此无彼的职业意识事实上更体现了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豪情壮志。这也正是我说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与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之间有着惊人一致性的真正原因之所在。”我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研究》的文字,主要目的并非为了强调这段话以及所表达的观点的重要性,而意在凸显文字背后的研究者的身姿。这是一位致力于再现语境,重回历史,并置身其中用“心”去体会的研究者。当研究者设身处地投入历史语境,回到历史现场,涵泳其间,细细体察,用心领会,那些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那些僵死的文字表述背后隐藏着的活生生的精神状貌也就展露出来了,而这又是皓首穷经的学究们无能为力的。

那是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语境,它孕育着现代的新人,以及新思想和新文学。现代“新我”的出现,终于使人告别了古典。他已经不再蜷伏于自然之中,跪拜于命运、神灵和政治权威之前,面对种种矛盾冲突一味采取避让雌伏之状;相反地已经开始以独立的个体来对抗和挑战权威、神灵、命运,乃至整个社会和自然。哪怕这一个体还依旧那么脆弱,不堪一击,而生命则已然是轰轰烈烈的了。由此,个人的世俗生活才获取最为重要的价值,崇高型审美才赢得社会的共振,现代审美主义思想才有了坚实的根基。

固然,充满同情心去做学术研究,既可以深深感悟到个中真义,也可能因资料占有不足或分析粗疏而流于主观臆断,以致做出过度阐释。但是,由于《研究》的作者带着自己的“心”深深潜入历史语境之中,也就有效避免了这一偏颇。

最让人意料不及的是《研究》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审美主义思想的论述。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这一时期的文学,并将它简单化地视为政治的工具,以至阶级斗争的工具,而《研究》却把它跟审美主义联系起来,命名为“政治唯美主义”,这确实匪夷所思。

《研究》深入分析了“文艺大跃进”、“样板戏”、浩然的《艳阳天》、“红卫兵诗歌”等典型现象,对“文学的想象如何纳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体系之内与之构成积极的互动关系,成为组织、整合、凝聚民众的审美话语系统?文学的审美原则是以什么方式让政治训诫获得审美的表现力?”诸问题作出独特的思考。细细品读《研究》,同时细细思量,你不能不惊奇地发现,原本风牛马不相及的政治与审美已在作者笔下实现“大联合”了;也不能不信服,唯有“政治唯美

主义”这顶帽子，才最合宜地戴在“文革文学”的脑袋上，鲜明标识着文学艺术当年的相貌特征。在那个年代，政治被推向了极致，审美也被推向极致。政治已不再体现各个社会集团间现实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它被极度夸大、扭曲，以至于完全失去了真实性。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充溢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杳见和过程，弥漫于呼吸的空气，甚至像克隆技术那样被根植入人的每一个细胞。即便一个婴儿，在他呱呱坠地之时，就已经“先天”地被打上了阶级烙印，不可避免要参与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失却真实性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虚构，它只能是主观幻想、人为杜撰的产物。政治本身已被“审美化”了。审美化的政治恰恰需要文学艺术来为它张目，或者说，它本身就已经成为“艺术的”，而且是“浪漫主义”乃至中国式“荒诞派”的，只不过还需要拉来文学艺术为它鼓噪助兴罢了。极致化了的政治是审美化的政治，它远离了真实生活，淹没了真实生活，改写重塑着社会生活，并在文学艺术中展现出令人眩晕的光芒。当主观臆造的政治再借助文学艺术想象的翅膀恣意翱翔时，它就切切实实成为“唯美”的了。至于审美所解放的感性、激情和非理性，恰恰又汇入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大扫荡、大破坏的政治斗争中，成为政治激情和政治想象的重要支撑。

在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是极富戏剧性的。知识分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主宰者，却沦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被改造者。这纯粹是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作者力图从五四运动本身去寻找端绪。在作者看来，作为五四时期重要思想资源的法国启蒙思想，包含着截然对立的两种倾向：其一以伏尔泰为代表，崇尚历史理性，强调最大限度地关怀个体价值；另一以卢梭为领袖，信仰价值理性，力主“公意”克服“私意”，“有道德的整体生命”代替“孤立的自然生命”。被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奉为偶像的不是伏尔泰，而是卢梭。卢梭启蒙思想中对个性进行道德洗礼的准宗教救赎情怀不仅为当年知识分子所激赏，在“大跃进诗歌”和“红卫兵诗歌”中同样得到突出表现。历史总在走自己的路。当年高喊“打倒孔家店”的知识分子，骨子里仍然渗透了儒家精神，而儒家道德理性与卢梭的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就注定他们必然要选择卢梭而非伏尔泰，也注定日后的革命必然要革到自己头上。哪怕最极端的反传统，都势必落入传统的陷阱。这就是历史。

《研究》以“审美乌托邦的构建：80年代审美主义话语的勃兴”，“语言论转向：一个勉强的过渡”，“审美主义的式微：学术规范、新理性精神及文化研究的崛起”来勾勒新时期审美主义思想演变的轨迹，并从典型文论作品的分析阐述入手，将审美主义话语的理论主旨和话语方式两个层面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文学理论领域浓重的美学化倾向；带着强烈个体情绪反应的诗意言说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理论话语的时代标志。这些论述切合实际，也是相当深刻的。然而，最为精彩的还是对“新理性精神”的分析。

《研究》将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置于审美主义思想演化进程中来阐释。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中西学与国学、“追新族”和“守旧派”之间的争论不绝于耳，双方各执一词、相互隔绝，尽管热闹非常，却由于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而无助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转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钱中文先生竭力倡导的“新理性精神”对“对话”的不遗余力的鼓吹和脚踏实地地践行，不仅为中西文论之间的真正平等对话提供了保证，而且为文学理论不同学派的出现开辟了良性发展的前景。因此可以说：“新理性精神的提出，于宏放的视野中为文论话语的转型建立起坚实的价值支点。”“新理性精神为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确立了一个总的原则。”

当作者将“新理性精神”与“现代性论争”的时代语境结合起来分析，其“新”之所在就更为显豁了。在这场波及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的论争中，对现代理性畸形地演变为只讲实用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备受人文学者青睐。尤其是在文论界，维护人的感性生命，反抗现代科技霸权，几乎被提高到文学艺术争取生存权的高度。作者在分析中指出，这种彻底抛弃现代性的决绝，显然缘于一种近似乌托邦冲动的非理性狂热。因此，“新理性精神的提出，表现出文论界的中坚人物对混乱的研究现状进行整合的努力，这种努力既体现了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又体现了对后现代主义非理性倾向的纠正。这也就是新理性主义之‘新’的根本所在”。

对于审美主义的诗性狂热，“新理性精神”无疑是一剂恰到好处的退烧药。可是，一旦以“对话”认可了“文化相对主义”，认可了多元共存的合法性，“文化研究”就乘机而入，并进而以自己“多元”的身姿和武断的态度来宣告文艺学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审美主义从勃兴走向式微。

按照作者自己的告白,《研究》并非要详尽描述审美主义在 20 世纪中国流变起伏的发展历史,而是着重阐释 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不同侧面。很显然,作者是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确定的研究目标,他抓住了审美主义最为典型的几种面相,为我们做出了生动描绘和深刻剖析。不过,在兴趣盎然地追随作者检视“家珍”的同时,难免也有那么一点小遗憾。在作者的宏观视野中,对典型文本本身所做的绵密分析似还稍嫌不足。这,或许是受审美主义的诗意言说的感染所致吧。

文学理论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一代代学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的结晶。《研究》在为我们展示 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复杂性,从审美主义角度透视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同时,将这个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一并带到我们眼前,为当今的文论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借鉴。在此,我不想一一重述《研究》提出的令人钦羡的创见,那是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亲身领略的。我想说的是:当今学术界太多没“心”的文章,太多没“头脑”的文章,却堆积、壅塞着各式各样的“敲门砖”,针对这种“研究”现状,《研究》无疑也是一剂良药。

是为序。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审美主义：透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视角 / 7

第一节 流动的现代性：近年文学界关于现代性问题研究述略 / 11

第二节 从康德到尼采：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西学资源 / 19

第三节 多元聚焦：当代中外学者的审美主义观述略 / 29

第二章 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起源语境 / 53

第一节 误读：古代中国是一个审美主义的国度？ / 53

第二节 反思：中国古代审美主义的局限性 / 62

第三节 重构：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起源语境 / 69

第三章 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以 20 世纪 20—40 年代
为中心 / 82

第一节 审美独立论：从“为艺术而艺术”到“纯诗” / 82

第二节 审美救赎论：从“人生的艺术化”到“审美化生存” / 92

第四章 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思想的政治特性：以 20 世纪 50—70 年代
为中心 / 100

第一节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典型过渡阶段” / 101

第二节 “全民皆诗”：“文艺大跃进”的诗学考察 / 109

第三节 “文革文学”：政治唯美主义的巅峰之作 / 116

第五章 从审美主义的勃兴到审美主义的式微：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
文论话语的转型 / 127

第一节 审美乌托邦的构建：80 年代审美主义话语的勃兴 / 127

第二节 语言论转向：一个勉强的过渡 / 143

第三节 审美主义的式微：学术规范、新理性精神及文化研究的崛起 / 149

第六章 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几个相关问题 / 160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 / 160

第二节 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与科学主义 / 176

第三节 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与激进主义 / 204

结 语 / 223

主要参考文献 / 226

附 录 本书相关的阶段性成果（论文）目录 / 233

后 记 / 234

导 言

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不是一个全新的论题。近 10 年来,文艺学、美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的研究者,都对这个问题表示出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而且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是在充分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对这个研究课题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补充工作。

这里我强调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一种“补充工作”,不只是一种表明自己有充分自知之明的防御性策略,更主要的是要表明,本书虽然称之为“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但我的任务不是详尽地描述审美主义在 20 世纪中国流变起伏的发展历史。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现有的 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成果中被忽略或者没有被深入探讨过的几个相关问题,发表我的一些在我看来多少还能为此课题的推进提供一点新意的看法而已。本书中的关键词“20 世纪”、“中国”、“审美主义”,看起来虽然都是让人不可小觑的“大词”,但我用这些“大词”除了旗帜鲜明地表明本书的论域外并没有更多的“用意”,也就是说,我“圈”了这么大的一个论题,更多地是为了表明本课题研究的学术针对性,而无意贪大图全地彰显不切实际的学术雄心。如果说在 21 世纪初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言说“20 世纪”,总多多少少难以避免地伴随着“千禧年”的狂热而“历史性”地具有了那种于 21 世纪到来之际盘点 20 世纪家底的责无旁贷的使命感的话,这种“勉为其难”的使命感也只能更多地归功于历史的惯性。换言之,这里冠之以“20 世纪”,其实已无意追求诸如勃兰兑斯的“19 世纪文学主潮”和钱理群等的